

古代调解息讼的司法传统

中国古代司法并非一味以刑杀为威,相反,所追求的是“讼简刑清”,力求实现刑措而不用和谐社会。历代所谓“盛世”,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“法致中和,囹圄常空”。“以和为贵”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。

早在汉朝已经有调解和息争讼的史例。据《后汉书·循吏列传》刘矩为县令时,“民有争讼,矩常引之于前,提耳训告,以为忿恚可忍,县官不可入,使归更寻思,讼者感之,辄各罢去”。韩延寿为左冯翊守时,“民有昆弟相与讼田,自言”,韩延寿自责未宣明教化,遂闭门思过。两昆弟

深刻自悔,表示终死不再相争。韩延寿以此“恩信周遍二十四县,莫敢以辞讼自言者”。

至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,司法官多以伦理为据调解争讼。例如开元中韦景骏任肥乡令,“县人母子相讼者,景骏谓之曰:‘吾少孤,每见人养亲,自恨终无天分,汝幸在温清之地,何得如此?锡类不行,令之罪也。’因垂涕呜咽,仍取《孝经》付令习读之,于是母子感悟,各请改悔,遂称慈孝。”有些著名的良吏致仕以后,乡人也请其裁决纷争。唐高宗时,元让以太子右内率府长史任满还乡,“乡人有争讼,不诣州县,皆就(元)让决焉。”

说明唐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。

宋时调解称为“和对”,已有官府调解、乡曲亲戚调解、宗族调解之分,而且趋向制度化。元朝调解结案以后,严定不许再起讼端。

清朝时调解息讼是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,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。

至清朝,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。清朝调解分为州县官调解与民间调解两类。州县调解是在州县官主持下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案件的调解,是诉讼内调解,带有一定的强制性。根据档案材料,在当事人“吁请”息讼的甘结中,双方都申明“依奉结得”,即遵命和

息。州县官还通过“不准”状的办法,促成双方和解,所谓“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。”

由于调解息讼是州县官的治绩和“大计”(考察地方官)的重要指标,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,首先着眼于调解,调解不成时,才予以审结。康熙时陆隄其任河北灵寿县知县,每审民事案件,则传唤原告、被告到庭,劝导双方说:“尔原被(告)非亲即故,非故即邻,平日皆情之至密者,今不过为户婚、田土、钱债细事,一时拂意,不能忍耐,致启讼端。殊不知一讼之兴,未见曲直,而更有纸张之费,役有饭食之需,证佐之友必须酬劳,往往所费多于所争,且守候公门,费时失业。一经官断,须有输赢,从此乡党变为讼仇,薄产化为乌有,切齿数世,悔之晚矣。”据《北京日报》

宋朝台谏官为何敢言

宋王朝的监察官——台谏以敢言著称,是强势的存在,发现政府“一事过举”,立即“议论蜂起,章奏交上,往往以死争之”。其实,宋代的台谏官并无“死”的风险。相传宋太祖立有誓约,藏于太庙,子孙继位之初,都要入太庙立誓,誓词是: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,“子孙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”。因此,两宋三百余年,基本没有一个台谏官因为上书言事而获杀身之罪,即便出口不逊,受到薄责,但很快又获得擢升。

宋朝台谏官的监察权与弹劾权,也对君权与执政团队的行政权构成强有力的制衡。

为什么宋朝台谏官敢肆无忌惮地弹劾执政官僚?其中一条非常重要,宋朝的台谏系统具有相对于政府系统的独立性。

宋代之前,御史与谏官都是宰相的属官,对政府的行政监察,属于内部监督。到了宋朝,台谏从政府系统中独立出来,成为与政府平行的国家机关,台谏官不再是宰相的属官。

宋王朝很强调台谏官的独立性。孝宗皇帝与经筵讲官张子韶有过一段对话:孝宗说:“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。”张子韶说:“以臣观之,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,亦不可承人主风旨。”只有让台谏官独立于行政官,才可以做到“弹击之际,无所顾避而得尽公议”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

清宫烧茶叶祭祀

在清朝皇家,饮茶是一件大事,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载:“初制,茶房设总领3人,承应长4人,并清茶房承应长4人。膳房设总领3人,承应长2人,庖长3人。”即茶房、清茶房、膳房三个部门共同负责,仅官员便有19人之多。

清廷对茶的选择偏爱普洱,但对其他茶叶也是兼收并蓄。明代为尊的六安茶,清宫依然喝,要求地方每年进贡400袋(每袋1斤12两),但入不敷出,不得不节约使用。乾隆元年(1736年),甚至索贡多达700袋。皇家人口不多,为何要喝这么多茶?其实原因不复杂,除了喝之外,还要用于赏赐和祭祀。清宫在祭祀中需烧一种叫“乌卜藏”的香,其中含沉香、白檀香、柏木香等,此外要加入武夷茶、六安茶等,多少好茶就这么被白白烧掉了。

据《天津日报》

美国人爱喝咖啡与爱国心无关

长久以来,美国人爱喝咖啡甚于喝茶,还常被拿来当作有别于英国的民族认同标记。史学家甚至把喝咖啡当作高贵、爱国的行为。大部分人都同意,喝咖啡习惯的养成与美国的建国关系密切——北美13州人民以喝咖啡向殖民宗主国英国表示反抗。

很多人都听过波士顿倾茶事件。在这次事件中,北美殖民地反英人士,将一箱箱茶叶丢进马萨诸塞湾,以抗议英国征收茶税及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殖民地茶叶贸易的权利。这个振奋人心的故事,替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注入了追求独立自主的光荣色彩。遗憾的是,这并非事实。促成美国人弃茶而拥咖啡的动力,其实只是贪婪和利润,而非光荣与爱国心。

美国人爱喝咖啡并非出于



波士顿倾茶事件

反英心态,而是因为奴隶制的存在。海地的奴隶在大甘蔗园里工作,生产大量的糖。但海地的自耕农和自由民欠缺资金开辟甘蔗园,于是这些乡间中产阶级转而辟种面积较小而成本较低的咖啡园,以卖给岛上一心要学巴黎人时髦作风喝咖啡的上层人士。种咖啡获利稳当,不久产量就超过当地需求。

美国商人出手援助,销掉剩余的咖啡豆。在这之前,新英格兰、切萨皮克两地的美国贸

易商从事三角贸易已有很长时间。他们运来食物供海地奴隶填饱肚子,运来木材、英国产品换取岛上的糖、朗姆酒,然后将其中一部分糖和朗姆酒运到英国脱手,换取其他产品。这些海运业者有时货舱未塞满,咖啡耐海上长途运送,腐烂慢,正是理想的货物。

于是咖啡价格暴跌。咖啡因此成为更多人喝得起的饮料。到了1790年,美国的咖啡进口量比茶叶进口量多了三分之一,十年后,咖啡进口量是茶叶的十倍之多。

咖啡成为美国生活方式里不可或缺的一环,而这与其说是因为美国人痛恨英国横征暴敛,因而连带排斥英国人爱喝的茶,不如说是广大奴隶使咖啡变得便宜且有利可图所致。

据《文汇报》

“筵席”一词的由来

在椅子传入中国之前,古人都是席地而坐,所以直到今天,我们还有“席位”“座席”的说法。

在上古时期,“席”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铺垫用具,在家具发展史上历时最长、最古老。甲骨文中,“席”被写成一个长方形的象形字,中间好似席的织纹,可见席的样式,几千年来大致一样。在闻名中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,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草席,在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,有四条草席,其中两条长2.2米,宽82厘米。其编织方法与现代草席相近。

秦以前,古人“坐”的姿势是

两膝着地,两脚背朝下,臀部落在脚踵上。如臀部抬起上身挺直,就叫跽,又称长跪,是对别人尊敬的表示。

采用跪坐的方式坐在地上,膝关节很容易遭受寒冷、潮湿的侵袭。虽然古人对住房内的地面进行了种种特殊加工,如用火烧烤地面,或抹一层白灰等,但人们要久坐,必须要有一定的铺垫物,即“筵”和“席”。筵和席都是铺在地上的坐具。筵长,席短。地上底层铺的较粗的叫筵,筵上面铺的精细编织物叫席,合而统称筵席,人皆席地而坐,在上面饮酒吃肉,称筵席。今天,人们还会

用“筵席”一词指代酒席。

古人以居席之礼别尊卑。有同席之限:男、女7岁以上、出嫁姊妹与兄弟、父与子等3种情况之一不可同席;也有异席之礼,《礼记》规定:群居5人,则长者必有异席;5人及以上,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外安排一张席子。这样就产生了“主席”这一词语。另外还有“首席”“末席”等词语,都体现了“席”的礼制意义。管宁与华歆因志不同,更是产生了“割席断交”这个成语。

至今在亚洲的一些国家,席地而坐仍然盛行。日本在一些传统的场合,还可以看到跽坐的场面。日本的榻榻米就是由席演变而来。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李自成兵败的两个原因

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年,先于清军进入北京的李自成看似众望所归,却迅速败亡,在短短100多天里上演了从“势如破竹”到“兵败如山倒”的大逆转,在北京42天后就仓皇撤离,这其中的原因何在?

李自成推翻明朝后,以为天下已归自己所有,对天下大势缺乏清晰的判断。他的第一大错误判断是关外的形势。李自成竟然

对山海关外存在多年的清军势力疏于防范,不派遣重兵防守,显然他对关外的形势相当无知。对吴三桂与清军联手之事,大顺军竟浑然不知。

李自成在北京期间的第二大错误判断是国内的政治形势。在北京,李自成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出现,始终保持农民的革命本色,对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朝统治阶级采取严厉的打击和镇

压措施。本来明朝官僚大多希望为新朝效命,但大顺政权对他们登记的目的主要是追赃逼饷,对三品以上者不予录用且关押到军管,四品以下录用的少数人也要捐粮助饷,此举把明朝官员推到了对立面。大顺军除了要对付清军的穷追猛打,还受到各处地方武装力量的打击与骚扰。

李自成没有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及时调整战备策略,对天下大势作出错误的判断,导致革命事业最终失败,值得后人警醒。据《学习时报》

古代地图是怎样“画”出来的

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《坤舆万国全图》走出“深闺”上了电视节目被大众认知。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《丝路山水地图》不仅反映了明代中国和西方的陆路交通,还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一种传统,注重旅行者视角。

中国历史上,更科学的制图传统来源于魏晋时期的裴秀。裴秀曾任职司空,负责地籍管理。他发现前人地图没有比例尺,而且方位也不严谨。他摸索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:分率、准望、道里、高下、方邪、迂直。三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图的比例尺、方向和距离,后三者用于校正实测里程。裴秀以一分为十里,一寸为百里,将前人绘制的《天下大图》缩为《方丈图》,“备载名山都邑”。他的门客还进一步将《方丈图》缩小到1/5,制作了西晋的全国地图。

裴秀的制图原则被认为是“计里画方”的渊藪。这种方法把地球当成一个平面,用于地籍管理、城市规划等小范围制图,误差尚可接受。但是,在制作大范围地图时,地球的球面导致的变形严重影响了准确度,地图质量大打折扣。北宋的《禹迹图》是现存最早的按计里

画方制作的地图。此时,裴秀时代已经过去了700多年,成图质量依然不可直视。明代的全国地图是罗先本1541年前后绘就的《广舆图》,也采用了计里画方制图。

怎样把地球的球面表现在二维平面上?这就催生了地图投影。最早准确测出地球周长的埃拉托色尼也最先创立了经纬网,绘制了地中海周边地图。1569年,墨卡托设计了正轴圆柱投影,相当于在地球中心点一盏灯,把地面上的点投射到垂直于赤道的圆筒上,绘成地图。在这种投影制成的地图上,经线和纬线垂直相交,地图上的角度与实际一致,是在大航海时代使用最广泛的地图。墨卡托地图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图,有两个突出要素:球面投影,经纬网制图。

墨卡托投影地图上,高纬地区面积变形大,甚至无法表示极点。把墨卡托投影的圆筒两端适当收缩,就可以画出我们日常最常见的世界地图:纬线彼此平行,纬度越高长度越短,仅中央经线与纬线垂直。1570年,这种地图以奥特里乌斯地图之名首次出现,现代世界地图由此奠基。据《人民日报》